

明以来湖北渔业产权的归属与变迁

江 涛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明以降是湖北省渔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的许多渔产归于宗族、村社名下,成为群体的共有财产。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防止资源流失,族群会通过各种手段对渔产进行争夺;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渔产的转移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另外由于水域资源的复杂性,渔产与属于同一水域的其他产权发生了分割现象,这就使得渔业产权的确定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状态。渔业产权的宗族占有形式及其对渔产的争夺、转移及分割对当时湖北省渔业乃至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渔业产权;占有形式;产权争夺;产权转移;产权分割

[中图分类号] K24;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09)03-0098-05

湖北省素有“鱼米之乡”美称,是全国闻名的水产大省,境内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包括长江、汉江及梁子湖、富池湖等大型江河湖泊以及数以万计的湖、河、池、塘、泉等,丰富的淡水资源使得该地成为各种鱼类的栖息之所。明清以降湖北渔业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渔业产权的归属及其变迁,势必对湖北渔业乃至湖北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明代以来,湖北渔业产权的占有形式分若干种,如国家占有、藩王占有、书院占有、宗族占有、村社占有、私人占有等,其中宗族、村社占有则是自明以降湖北渔业产权最主要的两种民间占有形式。

较早的时候,湖北有大量的荒湖,任人开发,人们在水域附近定居下来,以水为田,进行生产作业,时间一长,自然就将所经营的水域归为己有。汉川黄氏称:“明初武汉经兵燹之余,土著毕逃亡,故鄂籍多来自江西(于)沔汉湖莫宅,田渔为业,密迩江襄。”(湖北汉川《续修黄氏宗谱·原序》,1988年版)不管是本来就生活于水域附近还是后来迁徙而来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环湖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族村,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源于宋以来宗族制度在全国的兴盛。一方面,自宋以来,许多士大夫开始重新倡导儒家传统,更多地发掘血缘宗法伦理文化对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价值,并将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封建家族制度能够弥补政府统治的鞭长莫及,是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基础的最有力的地方基层组织,因此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这反映在渔业中,就是朝廷承认宗族的财产所有权。如明初由江西迁来湖北沔阳的刘氏一族:“我祖自(江西)西江来泛此湖,爱其水清鱼美,领其地于官,标竿以为界,周回数里。”(湖北仙桃《续修刘氏宗谱·恒产志》,民国三十七年版)“领其地于官”说明渔产作为族产的一部分,其宗族占有形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楚地湖区成员许多为同一祖先的后人,当然,也有部分村社为数姓同居或多姓同居,等到开枝散叶后也会形成自己的族群。鄂洲梁子湖共有捕鱼四大姓,其中的杨姓一族“由江西瓦杂街而迁居湖北鄂城梁子湖湖心圣地安聚落业,有十八代矣”,一直过着“男捕鱼女织网”(鄂洲梁子湖《杨氏宗谱·序》)的生活。正因如此,湖北水区的渔产多为沿岸宗族或村社(两者都可分为一姓或数姓共有)所有,如蒲圻县“蒲河渔业,雷、李、鲍三姓世掌之,河有二十三潭。……沧湖渔业,湖共四十一里,朱姓十之一,余悉归宋。……神山湖渔业,即董塘池,……尤、雷、郑三大姓傍湖而居多事渔业”(民国《蒲圻乡土志·农业·渔业》)。

虽然许多聚族而居的群体并非单纯的渔业户,大多数都是渔耕兼营,然而渔产却是他们进行家族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族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明代黄冈县民孙显祖“喜赈恤贫乏,有彭城塘,岁获鱼

[收稿日期] 2008-12-05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利,尽捐入宗祠供祭祀贫戚”(《人物志·笃行》,《黄州府志》卷二十四,光绪影印本)。清代新洲黄氏族产中的“南北二濠放鲜畜鱼,俾休养生息以供祭祀、以应户差,此我族之祖遗也”(新洲:《家规》,《黄氏宗谱》卷首一)。黄陂周氏宗族的文后祠堂“修理之费,尚恃鱼塘提出股款,永远维持”(黄陂:《祠庙志·文后祠堂纪略》,《周氏宗谱》卷八,民国影印本)。渔产可用于扶贫、供祭祀、纳税、修祠等。正是由于族产的神圣性及用途的广泛,宗族、村社对内部产业都相当维护,前述新洲黄氏订立家谱中就规定,南北两濠为其祖业,“守濠诸人日夜宜巡数次不可坐卧不理,若捕得偷鱼者尤不可徇情不报,如有隐匿不报等情守濠者革除不用。……开濠之时如守濠与捕鱼者串同作弊,并族内众人有私偷窃捕者从重议处,逮即送公惩治”(新洲:《家规》,《黄氏宗谱》卷首一)。不论是族内还是族外人,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都不得私自捕鱼,否则严惩不贷。一般而言,开湖之后,族人打鱼不受限制,至于外姓渔民,则不得随意入湖捕捞,即便能够捕捞,也只有在取得宗族的许可,在缴纳租课的代价下方可作业。1925年《八十户注册》记载蕲春县赤东、西湖:“向归八十户管有,肪于明,沿于清。”又《三修印册条例》记载:“八总公水权利每年三月三日以后,八月二日以前,凡东西二湖汜水时,除同治二年公主和约限制外,即私人子池亦属公水,私人不得干涉,若长江、长河、沿湖潭套等,无论涸水、汜水、常年皆归八户独有。”故此,至1949年前,八十户几乎占有全县所有水域,他姓渔民下湖作业须先交湖租水税。

二

水域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使得它的归属向来都没有土地那么明晰,因此,分属水权的渔产,其占有方式也就显得错综复杂。虽然自明以来渔产一直牢牢掌握在宗族、村社手中,然其产权从内部归属到外在形式都发生了一系列演变,其中既包括渔产的争夺,也含有转移和分割。

1. 渔产的争夺

为争得渔业产权,拥有水域的种族、村落之间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着长期而严酷的较量,最直接的莫过于武力械斗。基于长期的斗争经验,渔户也学会了倚靠中坚力量等更为高明的方式来争夺渔产。

(1) 武力争斗。在当时,湖水塘堰等大部分都属于一族一村所共有,对某一水域渔利的侵犯也就是损害到整个宗族的公共财产。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公共财产是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也是把族人团结凝聚在一起的纽带,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对于渔产的争夺就显得尤为激烈。汉阳钟明贵、周宏银双方为争夺蔡甸石洋湖之水沟、水垵及闸外下簰取鱼权利前前后后共打了三次官司,各执一词,甚至发生武力冲突。钟姓败诉后声称:“非惟民等百余年来世守渔业一旦归属于他人,……民等及钟、萧二姓群众虽肝脑涂地亦断难甘服,值此大局惶惶、乡区不靖之际,而双方大祸必发于俄顷,誓死决斗尤为事势所必不免难。”(《钟明贵、周宏银等确认鱼利权案》,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以下简称省档):LS-7-2752)输掉了渔产,就以整族整姓的复仇作为要挟手段,这就使得本身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更加复杂化。对渔利的纠纷甚至还发生于同一宗族不同分支之间,黄陂阮家湾分为南份与北份两支派,双方为争得渔利屡起冲突。1947年,北份村民十余人持械将南份成员杀伤,之后矛盾升级,南份将门口塘的鱼网取二百多斤,又将大堰的鱼网取一百五十斤,分给北份五十二斤,北份称对方不按照南北两份户口公分事实,而想少给,因此拒不接受,又起纠纷(《阮观铎、阮主喜等鱼塘所有权纠纷案》,省档LS7-2-349)。

(2) 借助政府或乡绅等地方势力的帮助。当使用暴力无效或是想更为和平地解决问题时,渔户们往往会向政府申诉,寻求保护,而地方政府也往往愿意参与其事。为维护鄂州茅圻塘的鱼税,防止“不法之徒黑夜来塘肆窃,间有无知之辈白昼驾划强取”,光绪九年政府发出通告,茅圻塘“所有让出水面鱼草仍归张、刘、谈三姓采取,别户不准争夺”(《钟芳敦、刘发祥等确认湖汉所有权案》,省档LS-7-2-753),明确三姓对渔利的占有权,对敢私自采捕者进行严厉处分。上举周姓与钟姓之争,1944年,周姓开闸取鱼,“因地方人众,曾请当地驻军弹压以维治安”。然钟姓则称周等勾结当地驻军,于开闸之际“借武装士兵之力强将下簰之鱼一并取去”。由此可见,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求助于政府委派人员是当地人民争夺渔产的常用手段。另外,借助地方势力平息纠纷,也是常用手段之一。在渔民与政府之间,还有一层中间力量,即地方士绅,他们中有许多取得过功名,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深得普通百姓信任,“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

士”(汪辉祖《学治臆说·礼士》)。同时,它的社会功能与权威性也使得政府寄希望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使民事矛盾在基层就得到解决。民国年间,黄陂耿、刘两姓因邱陂塘田水发生争斗,致演成诉讼,经士绅等从中调解,双方才暂停纷争(《刘健宏、耿明甫等确认养鱼权及契约案》,省档LS7-2-709)。正如争夺渔产的渔民所言,为争渔利,“或经地方调处,或诉由地方官厅断结”,这也确是当时湖北地区和平解决渔利纷争的两种最主要手段。

2. 渔产的转移

为防止族产的流失,许多宗族都规定渔产不能转移。天门萧姓规定其所有的东湖“不许出卖他族”(《严少陵、刘玉善等确认取鱼权利案》,省档LS7-2-779)。即使买卖,也多限于宗族内部。武昌贺氏设立塘规合约,“塘向系两股公产,或有买卖,只在本股交易”(武昌《大塘老合约》,《贺氏宗谱》卷三上,咸丰影印本)。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买卖关系日益频繁,私有产权的流动范围不断扩大,渔产的转移又是无可避免的。同时,由于渔产体现的往往是整个宗族的利益,因此,族内对外人出卖渔产,一定要在族内权威人士或各姓都认同的情况下才算有效。嘉庆十三年,江夏县梁子湖区周孟林置卖鄂洲夏爬湖九股便是得到了同是拥有湖产的樊、叶、刘、王四姓同意,“自卖之后卖主亲疏人等不得生端异说”(鄂洲梁子湖《叶氏宗谱·夏爬湖文契》)。证实了当时买卖渔产并非一人之事,往往会有同族同村之人进行干涉。民国年间,黄陂县陈、黄两姓争夺何家塘渔利,陈姓以黄正舍与之签定渔利合同为据,认为该塘养鲜取鱼权应归于己姓,黄姓则认为该合同无效,因为签定合同的只是黄姓一员,并无黄族中的权威人士见证(《陈年安、黄柏青等确认养鱼权案》,省档LS7-2-615)。

除了变卖渔产股权之外,渔产转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宗族渔产投资于教育事业。明以来的湖北,渔业大户用所得渔利资助教育事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许多宗族也会将部分渔产馈赠给学校。此传统在民国年间仍有沿用,黄陂县阮家湾阮姓北份将本湾与下陈湾族人所有公共租产鱼塘均捐作共立陈留小学之基金。同县县民耿姓也将邱陂塘鱼利拨归该族私立之双星小学,前述陈姓也将所争何家塘鱼利归入该族锦公教育基金。将鱼利归入教育基金,有本着为本族教育事业发展做贡献的目的。然而,由于书院学校的产业一般都能得到政府更有力的保护,黄陂县民将鱼塘捐作教育基金,并呈报官府,实质上即是通过政府来固化渔业产权的归属,以防他人侵占。

虽说宗族、村社对渔产的占有权会时有变动,然而,此种占有形式却已根深蒂固,至民国仍牢不可摧。清末及民国都曾实行乡镇自治,希望乡村社会能够发扬民主,改良风俗,然而,“简言之,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利的企图”^[1]。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内外矛盾频多,政府也无暇顾及地方事务,湖北乡村社会并未受到太多影响,仍按照旧有的宗法制进行管理。虽然,政府也曾进行过公产清理,希望将产权混乱的田产、鱼塘等收归国有,但是,宗族仍能力所能及地维护其族产的所有权。1937年,武昌县清理湖产,在产权一栏填到“是项产权照渔课二字解释系属一种租赁性质,其所有权应为公有,惟各湖完课户柱少则数户,多则数百户不等,积习相沿已成世袭,且沿湖住民大多借此为生,若一旦收为公有不免影响湖民生计”。因之在统计湖业时,“按照民法尊重社会已成事实起见,其产权应属原管湖人所有以维民生而免纠纷”(《湖北省财政厅、建设厅拟具整理湖泊税收实施办法》省档LS19-2-2415)。可见已对湖产及渔业权的宗族占有形式无可奈何。

3. 渔产的分割

一般来说,在数族数村同时占有一片水域时,为避免纷争,各自都会将渔产划分清楚,同姓同族为了避免内部矛盾,均衡利益,也会对湖产进行内部分配,而以股分的方式确定各自的渔产是明以来湖北省的习惯做法。黄陂县《周氏宗谱》载:“各村皆有鱼塘林场,多系合股培养,获利则按股均分,名曰鱼股、树股。”鄂州梁子湖祖遗陂字石内湖池一段共八股,祖业向系除国课外公取公分,乾隆年间“人心不齐每年槎费公本难出,及至取鱼时不由分说不照八股分收,以至槎费空悬”(鄂洲梁子湖《叶氏宗谱·陂字石湖池契尾》)。

然而,随着利益分配矛盾的不断深化,渔产的分割在所难免,而湖池的资源特性决定了它衍化出有别于土地的产权分割方式。农田需要用水灌溉,水产类更是需要水体来进行繁殖,多种行业同时对水资源需求时则会产生矛盾,因此,在进行渔产分割时,须写明渔业权与耕作权、灌溉权、泥地权、种藕权等各

自归属。各地对渔业产权分割有其约定俗成之习惯,据清末民初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政部所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之《湖北省关于物权习惯之报告》记载,湖北省部分地区渔业产权分割之具体情况如下:黄陂县塘堰例分使水权及养鱼权二种,两者往往各有其主。这种习惯可从该县争夺渔产案例中得到证实,黄陂县陈家树村陈族几百年来一直拥有大、小簰湖养鱼权,民国年间众姓见陈族请税养鲜,恐有妨碍荫救(即灌溉),经调解明白约定“众姓有使水灌溉之权,但养鱼权为陈姓所独有”。陈姓也表示“契载该湖取水仅能车水荫救,不能干涉我族养鲜,我族亦不能借有养鲜致阻他人水路”(省档LS7-2-761,谢得年、陈德平等养鱼权案)。渔、水的划分标准得到了县民的认同。黄冈县湖泊例分湖业所有权及湖地所有权,水涨时管湖业者取鱼,水退时管湖地者取草。当然,其他留于地表的物件也应归于管湖地者取用,如泥土等。

笔者注意到在提及塘堰时,多是养鱼、捕鱼权与灌溉权的分割,湖泊则多是分割出“湖水权”与“湖地权”。《调查报告录》记载郢县此两权未分情况时说明“湖地所有权与湖水所有权分别管业,凡鄂省管有湖业者,多系如此”。这是由于根据省内湖泊多有秋冬水涸、春夏水涨这一特征,水量充沛时湖水可以蓄鱼、湖地可以种植芦苇或莲藕等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及粮食作物等。如黄陂县邱家湖范围内之牧牛场(又称牧牛湖)，“有草时众姓牧牛,有水有鱼时,独归王姓取鱼”(《袁礼卿、王春山等确认取鱼权范围纠纷案》,省档LS7-2-481)。不过,将水权例分使水权及养鱼权二种,也许只是黄陂塘堰习惯,对湖泊不一定适用,不能将其普适化。当然,以水的性质来确定采用哪种产权的分割与以地方来确定都不是一定的。如上述汉阳萧倚云将祖遗上、下石洋湖三口等水区卖与他人,标明上湖与薛家湾、窑湾、斗山凹只有水面,泥脚不在其内,发生灌溉权与养鱼权分裂的既包括湖,又有湾、凹之类。

三

渔业产权的宗族、村社占有形式对当时整个湖北渔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宗族、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使得它比一般的组织更容易凝聚力量,有利于积累熟练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传授者会十分耐心地教授家族其他人捕捞作业的要领,传统生产技术在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授、总结,技术继承的对象很稳定。还可以充分利用全族的劳动力,比较和谐顺畅地分工协作,从事渔业生产。同时,在族长的监督、宣导之下,族众往往能够做到安分守己,将完粮纳税当做自己工作的头等大事,有利于家族集体对于国家赋税的交纳,维护上层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小集体占有形式必然有其封闭性与狭隘性,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世代代聚族而居的隔绝状态,保持家族内部对自然经济的绝对控制,防止外部势力的进入,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

宗族、村社间的渔产争夺战持续不断,就在于宗族比一般的组织更容易煽动矛盾。很多家族纠纷的起因无非是一些田土细故、口角是非,如果没有家族势力的挑动和组织、策划,是不会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的。矛盾一旦发生,家族的地主阶级、族长、族绅等总是把自己阶层的私利装扮成整个家族的利益,打着保卫家族的幌子,挑动族众主要是贫苦农民,来为家族的利益作斗争。族众们由于受到封建宗法思想的毒害,把所谓的家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一旦认为家族利益受到侵犯,就会为着保卫家族利益而参加械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之后的家族械斗,无一不是打着保卫整个家族利益的旗号,也无一不是由于家族势力的挑动而酿成的,这种争斗既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又容易激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比如对外姓捕鱼的限制,适当的限制有利于维护本族、本村的渔产利益。然而,许多宗族借着人多势众,将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的荒置水域占为己有,驱逐本身在此捕鱼的单个渔民,因而经常引起经济纠纷。民国年间汉口成立市渔会,要求渔民必须加入,此举引起余家湖湖民的担忧,“渔业一项一经并入市渔会,则原有湖民渔业人二〇七户虽可仍旧各自享有渔利赡养身家,但忧虑其他同业会员,从此加入本湖捞鱼势必朋分其利,且有湖民三五户向来坐收全湖渔业利润及利贷,吸尽全体渔户膏血,反被誉为本湖善人,受全湖渔户拥戴,因此深恐一旦并入渔会,均丧失了渔业上独占权利”(《余家湖鱼藕纠纷》,武汉市档案馆档案号:104-10-1802)。因此秘密联合阻拦归并,并迁怒属会(临时护理会务)同人与渔会有勾结情事。余家湖湖民因害怕族产外享而拒绝加入当地渔业组织,实质上是丧失了一个既能保障渔民权益,又能增进其知识技能,改善其生活,并谋渔业之发展的机会。固步自封、思想狭隘使得传统思想和技术无法得到革新和提高,也就只能使自己的生产、生活原地踏步。另外,渔产是族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族田在大多数村民看来才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许多目光短浅不愿意从外界引

进先进技术而做到两利兼得的宗族、村落往往会舍渔利而顾田利,如填湖造田等,直接影响渔利的收成。民国恩施之桑枣坝有一较大蓄鱼池,“惜若久旱时,池水即须灌田,即鱼类正在发育狂盛之期,亦只好忍痛不顾”(《湖北省农业改进所购买鱼秧情况报告》,省档 1S32-1-804)。严重影响了本地渔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宗族制度的确比较适合封建社会对基层治理的需要,对维护地方经济秩序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随着宗族权利的过度膨胀以及清中后期各种先进思想、生产方式的传入,宗族制度越来越呈现出它的一系列弊端。保守的宗族、村社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生产方式,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是,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缺陷,也就很难在经营理念上发生质的改变。湖北渔业经济从明至民国逐渐衰退,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也与这种占有方式存在的诸多弊端有一定联系。

渔产的转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表明了地权在当时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早期的渔产转移一般是向着渔业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如前述汉川刁汊湖黄氏先祖本以力田为主,自洪熙至成化年间,水害为灾,众姓氏遂变卖田产转徙他乡,惟黄族坚守故居,改田为湖以谋生,多方筹资,陆续买尽湖产,之后完全以捕捞为业。这一时期,许多宗族都是靠买断别姓水域权达到积累资本的目的。大型湖泊的集中经营管理促进了湖北渔业经济的发展。然而自清中叶以来,渔产的转卖多是因为湖泊淤浅,无足够渔税可纳,许多渔产的买卖还是发生于宗族与宗族之间。虽说转换了所有者,但同样缺乏科学的养殖方法,其落后的管理方式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只能被动地受环境影响,渔业亦不可能得到发展。更有些人众日益庞大的宗族,将湖池买进后开垦成田垌,以发展农业。湖北省农业经济的日益发展,部分程度上是以水域面积的收缩、渔业经济的衰败为代价的。民国年间湖北省农林部淡水鱼养殖场曾到各县市调查渔产情况,希望能买下或承租一些私人鱼塘,用于试验先进的渔业生产及捕捞技术,然而该项工作并非顺利,一些宗族、村社所管辖水域虽然鱼产收获量不大、生产技术与工具都很陈旧,但还是不愿放弃对族产的占有,只有转移到养殖场的部分鱼塘的确成为改良水产的实验场。

至如渔产的分割,则对湖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早些时候湖中各种伴生物尚可任人采取,根本没有明确其产权,然而随着人们产权观念的不断强化,湖中各物都须确定所有权归属,这就造成了渔利与其他各种利益之间的分割。确定产权关系一直都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首要前提,产权的明晰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纠葛,有利于明确生产者的生产范围,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提高生产积极性。从前要么水中所有权利都等同于渔权,尽归于捕鱼者,捕鱼者不利用,其他的人也无权干涉,白白浪费许多资源,要么因分割不明,大家为争夺各种权利斗得头破血流。将渔产从湖产中抽离出来,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湖中各项产权,捕鱼、取水、挖藕、打野鸭、开垦、割草,大家各取其利,避免了纠纷。到了清代中期左右,不管是河湖之中所有权利都应归捕鱼者所有还是分割开来,宗族在将族产卖出或出租时,都会将水域中各种利权划分得很清楚,为利用水浅或干涸之时进行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便利,也使各种农作物生产和渔业生产都可以借助于同一供养区域展开,有利于农渔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邓建华]